

山西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对策建议

山西省社科院廉政中心课题组*

摘要：山西一度发生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政治生态一度严重恶化。站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新起点，深入剖析山西政治生态一度恶化的表现、过程及原因，对山西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和剖析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演变过程、具体表现和深层次原因，概括和总结净化山西政治生态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深刻反思在净化政治生态过程中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抓“关键少数”与落实主体责任并举，彰显净化政治生态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作用；严厉问责与容错纠错并举，努力形成愿作为、敢作为、会作为的良好政治氛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并举，厚植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转变政府职能与优化营商环境并举，构筑“清”“亲”政商关系；正党风政风与带民风社风持续好转并举，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政治社会文化氛围和环境；实践探索与科学评估并举，构建政治生态评

* 课题组长：李中元，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研究员。课题组成员：宋建平，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庞丽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执笔人：庞丽峰。

价体系。

关键词：山西；治理腐败；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呈现的基本状态，由组织、个体及相应的制度体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构成。山西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不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的创新性实践探索，为区域政治生态治理修复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站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高度，对山西政治生态一度恶化的表现、过程及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和反思，对山西实现政治生态持久风清气正和其他地区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都有重要意义。

一 山西政治生态的演变过程及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原因剖析

2014年，山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煤焦、交通、国土资源等领域成为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灾区，7名省级领导干部被立案调查。一些领导干部沦为不当利益链条上的“提线木偶”，“一拉一大串”，“一倒一大片”，“一端端一窝”。这些腐败问题充分暴露出当时山西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的问题。2014年9月1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对山西原省委领导班子进行重大改组式调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出席山西省领导干部大会上宣布中央调整决定时指出：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

（一）山西政治生态恶化的表现

发生系统性与塌方式腐败，意味着山西政治生态已经严重恶化。从已经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一度山西官商之间、官员之间关系严重畸

变，党风政风社会风气不正，一些领导干部在扭曲的政治生态中走上了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违法犯罪的不归之路，种种表现令人震惊。

山西政治生态恶化突出表现在腐败案件量大面广、频发多发，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特征明显。随着查办案件力度的加大，过去隐藏的腐败存量集中爆发，涉腐官员多、层次高，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出现“集体沦陷”。纵向看，上到省、市，下到县、乡、村，几乎所有层级都发生了腐败问题；横向看，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等都有腐败渗透和侵袭，煤炭、交通、国土资源等部门成为当时腐败的多发系统，甚至纪检监察、组织部门“灯下黑”问题也时有发生。

山西政治生态恶化集中表现在经济领域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政治生活“私人化”和买官卖官问题猖獗，社会上歪风邪气盛行。煤炭资源十年黄金期所带来的巨大利润，诱使商人与官员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共同体。特别是在资源开采领域，部分私营矿主与手握资源出让、资源整合审批权力的官员相互勾结，快速积累起巨额财富。商人为官员出钱、官员为商人输利，权钱交易，权力资本联姻的空间扩大，严重污染破坏了政治生态。

山西政治生态恶化深层表现在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盛行，一部分党员干部政治信念丧失、道德沦丧。具体表现为找靠山、拉关系司空见惯，洁身自好、正直肯干的干部成为不入群的“另类”。“琢磨事儿不如琢磨人”成了一些人投机钻营的金科玉律等。腐败“重灾区”吕梁市，围绕煤炭利益的“黑金”政治大行其道，一些能干事、想干事的干部屡屡碰壁，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

（二）山西政治生态演变的过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政治生态之所以恶化，并非一夜之间的“大厦倾倒”。它是一个渐变过程。纵观山西反腐历程，在不同时期也取得了一定的反腐成效，但因监督惩戒力度不大，腐败毒瘤越长越大，最终发展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地步。综合分析，改革开放以来，

山西政治生态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9）山西政治生态总体良好，腐败问题基本处于可控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能源、原材料、运力紧张背景下，在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以及国企改革、金融、技术、土地等要素市场放开的进程中，体制外市场力量向行政权力获取资源的冲动增强，公权力腐败的机会大大增加，权钱交易现象逐步增多，以寻租为目的的各种经济犯罪开始出现，个别握有实权的官员还出现从“寻租”向“设租”的腐败趋势。山西与全国一样，始终重视反腐败工作，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展了多轮专项整治工作。比如，1996年2月，省委、省政府在“一整两反”（整顿财经纪律，反对官僚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行动中查处违纪问题单位16498个、违纪金额10.59亿元，取缔“小金库”500多个，269名涉案人员中，按党纪、政纪、法律惩处了194人。预算外资金的清查使44名涉案人员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律惩处。一年中，全省检查出公款“吃喝玩乐”1259次，曝光180人次，收回补交款6.4万元，按党纪政纪处理26人（丁继云、王泽斌，1999）。以上数据和案例，一方面反映了山西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效；另一方面反映出，由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起来，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漏洞为腐败滋生留下了空间。这个阶段腐败势头基本处于可控状态。

第二阶段（2000—2011）与煤炭“十年市场黄金期”叠加，煤焦领域腐败成为山西政治生态恶化的“催化剂”。

山西的优势在“煤”，经济发展靠煤，问题也集中出在“煤”上。进入新世纪，我国煤炭市场经历特困期后逐步复苏，延续了持续十年的价格上涨期，山西“煤老板”一夜暴富的财富传奇逐渐增多。2005年，山西有合法煤矿4200个，而非法煤矿比这个数字要多很多。“每个非法的矿没有十个八个基层党政干部和执法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保护伞，它是干不下去的”成为当时资源与权力结合的真实写照。据当时通报

整顿官员从矿撤资退股的情况显示：全国总共申报登记投资入股煤矿官员有5357人，入股金额人民币7.55亿元。而山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就有1126人申报投资入股煤矿，投入金额1.7亿元，分别占到1/5以上（王继军，2014）。煤炭资源在向民营企业有偿出让、煤炭资源整合等不同主体间的倒手，部分地区权力与资本联姻共同掘金，坊间广传“黑金时代”的“心比煤黑”、“煤商与红顶”、“养商与买官”之说，山西“政治雾霾”指数出现了“爆表”。吕梁等煤炭资源富集的地方成为官员沦陷和政治生态恶化的重灾区。

第三阶段（2012—2017）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发生后，山西形成强力治理腐败的“高压态势”，政治生态渐显风清气正。

从揭露出的腐败问题看，山西腐败“井喷现象”令人震惊、震撼，所查处的违规违纪干部呈量大面广、集体坍塌的特征。省部级干部落马7人；市一级，省会太原连续三任市委书记、三任公安局局长被查；县一级，高平市连续两任市委书记、市长、一名纪委书记被查处。还有一些乡镇、村级干部也深陷腐败泥潭。面对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山西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反腐败持续加力，“打虎”、“拍蝇”不歇停，以刮骨疗毒的勇气重典治乱，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标本兼治打出精准有力的“组合拳”，不断推动管党治党由“宽松软”走向“严紧硬”转变。截至2015年前9个月，山西省立案数、结案数、处分人数均排全国第一位，形成了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这一阶段，山西在“减存量”、“遏增量”的同时，注重标本兼治，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小病快治，小错即纠，澄清问题，让干部放下包袱干事创业。

第四阶段（2017— ）山西政治生态实现由“乱”转“治”的重大转折，进入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新阶段。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对山西净化政治生态给予了肯定评价，标志着山西政治生态实现了由“乱”转“治”的重大转折性变化。面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山西从上到下都清醒地认识到，山西政治生态好转只是“大病初愈”，还需“康复治疗”和

修复巩固，既要做好刮骨疗毒的工作，又要做好修复“土壤”的工作，在“一个指引、两手硬”工作思路和要求下，坚持抓思想从严、抓管党治党从严、抓执纪从严、抓治吏从严、抓作风从严、抓反腐从严的“六严”并举，突出制度治党，严格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下大力气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着力打造风清气正的新“名片”。

（三）原因分析

山西政治生态恶化、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与其他地区相似的共性原因，也有山西特有的资源型经济、历史文化及地方政治生态的原因；既有制度、主体、监督方面的原因，也有市场经济拜金主义文化等负面的因素影响。从山西省情实际、历史文化特点、政治生态演变过程来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 主体虚位、监督缺位、权力越位相互交织，管党治党宽松软

这是山西政治生态恶化、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根本、主要和最直接原因。一些党委主要领导第一责任人意识不强，重业务不抓党风，重经济发展不重廉政建设，履行主体责任缺少规范化、精细化、可操作“责任清单”。一些地区、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宽松软，对干部身上表现出的腐败苗头和倾向实行“鸵鸟政策”，使一些大案要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未能对腐败行为做到零容忍，没有形成震慑效应，助长了一些地方和部门权力异化和腐败猖獗。

2. 行政权力与市场边界不清，权力过多干预资源配置

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导致权力对资源的错配、乱配，局部地区形成官员与商人结盟攫取利益。在山西煤炭资源开发领域，伴随着开发主体的变迁，许多地方发生了公权力被双重“俘虏”的可悲局面。在资源开发主体从国有走向私营，再从私营被收归国有的反复过程中，政府有形之手始终掌控着资源出让、安全监管、资产整合等重要环节，一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在“资源变现”过程中获得了巨额收益，发生了“管制者被俘虏”的问题。某些负有纪律

监管和司法监督责任的官员在巨额利益的引诱下，加入官商利益联盟，出现“监督者被俘虏”的严重腐败问题。

3. 干部选用导向混乱，不正之风盛行

山西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是政治生态恶化的外在表现，源于选人用人不良风气持续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背后是一些地方和部门选用干部的标准的变异。在干部选任程序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不能严格按照干部选任程序开展工作，对“一把手”的用人权缺乏有效监督措施，“少数人选人”的格局长期固化，为提拔“自己人”、“圈内人”提供了机会和空间。那些“带病提拔”的干部上台后，必然无视党纪国法，变本加厉地寻租权力，加倍寻求利益补偿。如此恶性循环，贪腐现象必然泛滥成灾。据2014年上半年山西省万份民调问卷显示，除22.2%受访者不了解外，12.32%认为所在地区、部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干部带“病”上岗、提拔等现象比较普遍，3.74%认为比较严重。

4. 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甚至一些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放松党性锻炼，理想动摇，信仰缺失，价值观严重扭曲，道德失范

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固然有资源型经济弊端、制度漏洞，不良商人围猎腐蚀等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淡化、宗旨意识薄弱、价值观扭曲，“不想腐”的思想防线垮塌。腐朽的官本位文化仍有较大市场，有些人当官不是为民而是为己，不是为公而是为私，为一己私利出卖公权力。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伴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更使得这些信仰信念缺失的官员在钱色诱惑面前彻底溃败。

5. 腐朽文化和不良社会风气与不良政治生态相互影响，恶性循环

受不良风气的浸染，一些地方的社会风气随之恶变，经商要与权力结盟、“进步”要有靠山、办事就要用钱开路……这些观念一时成为某些人观察、判断社会的“共识”和行事、办事的“经验之谈”。容忍、赞同、羡慕、参与“潜规则”以博取“成功”的不良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反过来又加剧了一些地方政治生态的恶化。

二 山西净化政治生态的治理举措及当前存在的问题

改组后的山西省委领导班子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对山西工作的新指示和新要求，针对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和严重恶化的政治生态，接续发力、多措并举，推动山西政治生态实现了由“乱”转“治”的重要转折。

（一）治理举措

1. 明确“一个指引、两手硬”重大思路和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部工作，为构建省域良好政治生态做出了科学的顶层设计

改组后的山西省委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对山西的指示要求，针对山西发展所处方位、突出矛盾和发展目标，提出“五句话”、“一个指引、两手硬”等重大思路和要求，明确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14年9月至2016年7月，提出并实施了“六权治本”、“六大发展”、“六型转变”、“干部六查”等重大举措。2016年9月，省委召开专门会议，提出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巩固、深化、提高”六字方针和五项目标；10月底，省委第十一次党代会，对在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中交上“山西答卷”做出全面部署。科学的顶层设计推动了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有效净化政治生态，也带动了经济发展转折性变化。仅2017年一季度，山西全省GDP增长了6.1%，一举扭转了连续几年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局面，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基础。

2. 坚持零容忍、全覆盖，保持高压态势，强力正风反腐，持续净化政治生态

近几年来，山西省委坚持“六严”并举，明确全面从严治党五个方面要求，提出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六项重点任务，以永远在路上的意

志和决心，聚焦重点难点，推动各项管党部署落实落地。2014年1~7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群众举报41689件（次），初核案件线索6352件，立查案件6712件，结案6515件，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126.77%、44.59%、45.16%和43.16%；处分违纪党员干部7148人，同比上升41.85%；同时，建立起了责任倒逼、日常督促、问题限时解决等机制，让主体责任落地生根。2016年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被问责1115人（姚晋平、陈俊琦，2017a）。2017年，全省处置问题线索50940件，增长32%；立案17401件，增长8.9%；结案16846件，增长6.5%；处分16979人，增长1.3%，其中政务处分3688人，移送司法机关382人（人民网，2018）。全省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3021件，处理3021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772人；共查处扶贫领域问题1098件，处理109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64人（刘宇、闫书敏，2017）。从已经查办的案件中，人民群众真正看到了腐败无“特区”，“不敢腐”的压力正在层层传导。

3. 先立规矩再选人，调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省委坚持先立规矩再选人，严厉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出台了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改革创新合理容错“三个办法”。2016年，全省共有449人被取消选拔或提名资格（赵向南，2017），一大批忠诚、干净、有担当的好干部被选拔任用到各级领导岗位，充实了领导干部队伍，树立鲜明正确的用人导向。在换届工作中坚持“不廉洁的干部不能用，不干事的干部也不能用”的原则。2016年，省委和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省委以换届为抓手完善选人用人制度体系。先后出台6个干部工作制度性文件，形成“6+X”制度体系，为换届工作立起了一套纪律严明、职责清晰的硬规矩。对涉及换届人选进行了“六查”，坚决防止“带病提拔”。从政治上、精神上、物质上、生活上和工作上对积极干事创业、工作业绩突出的干部旗帜鲜明褒奖，对大胆改革创新的干部支持和保护，为担当的干部担当，对负责的干部负责。

4. 开展警示教育，彻底清除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思想流毒

省委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部署，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及“学习讨论落实活动”，加强培训学习交流，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思想觉悟，切实增强对讲话精神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2017年2月底，省委连续举办6期省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要求党员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站位。省委高度重视涵养党内政治文化，在全国率先出台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把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2017年6月右玉干部学院、太行干部学院相继正式揭牌并投入使用。太行干部学院共举办培训班27期，培训党员干部2114人次；右玉干部学院共举办培训班23期，培训党员干部1580人次（姚晋平、陈俊琦，2017b）。全省各级党组织通过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右玉精神，有效滋养激励了广大党员干部，涵养了政治文化，培厚良好政治生态土壤。

2017年5月，省委部署开展以全面肃清流毒为主要内容的警示教育，要求高度警觉“事已过去”、“与己无关”、“淡漠责任”三种认识误区，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彻底清除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所造成的不良政治生态消极影响。省委以上率下，从根子上深刻剖析金道铭等7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及原因教训，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

5. 紧紧抓住管党治党的“牛鼻子”，全力推进“两个责任”的落实

省委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抓住管党治党“牛鼻子”，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制定出台了《山西省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施办法（试行）》，强化追问责。2017年，省委常委会议全年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43次。省市县三级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管党治党工作2807次，批准立案审查、留置措施、处分决定等4660人次。各级党委和纪委针对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不严不实、“四风”和腐败问题频发、巡视整改不落实等问

题，共问责党组织 133 个、领导干部 1093 名，倒逼主体责任有效落实（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8）。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 构筑“山清水秀”良好政治生态的思想基础还需进一步巩固

山西政治生态由“乱”转“治”，发展由“疲”转“兴”。一方面空前增强了山西干部群众净化优化政治生态、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信心；另一方面，一些干部群众中存在的“松松劲”、“歇歇脚”、“走着瞧”等消极思想情绪值得注意，特别是领导干部“总开关”问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好了，不可盲目乐观。所以，必须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坚持不懈地开展思想教育，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头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强化纪律规矩意识，打牢构筑良好政治生态的坚实思想基础。

2. 部分干部“不作为”、“慢作为”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从严治党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连续打出惩贪治腐、正风肃纪的组合拳，一大批“老虎”、“苍蝇”应声落地。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之后，面对持续高压反腐败态势，为数不少的干部，尤其是那些自身“不干净”的领导干部惶惶不可终日，出现“不作为”、“不会为”、“慢作为”的现象，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观望态度对待工作，遇到事情就“推”，遇到困难就“绕”，遇到责任就“躲”。目前，这一现象还在一些地方、部门不同程度存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有权就任性”、“无权就不为”的作风具有顽固性。

3. 对干部廉洁与能力并重的考察机制尚需健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高压反腐，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 300 名，包括 3 位市委书记、16 位县委书记、13 位县长（《新京报》，2015），极大影响着正常工作的开展与推进。在考察干部中，由于对领导干部能力素质品格业绩等考察的考核指标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偏重于对领导干部

的廉洁考察，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一味追求“洁身自好”，在面对经济转型矛盾和问题时“没想法”、“没办法”，干事创业的能力、活力和动力亟待进一步强化。

4. 对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教训，反思和总结有待进一步深入

4年来，历经持续的高压反腐，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被动局面和负面形象明显扭转，腐败蔓延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根治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净化优化政治生态，绝非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我们对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产生的背景、原因、过程以及危害还缺乏深度剖析，结合当前不断产生新情况新问题的深入反思，也有待进一步深化。

5. 制度的笼子还需持续扎紧扎牢落实落地

目前，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档，有些问题存在已久，但解决问题的制度没有及时建立，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一些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过于宽泛，不接地气，缺少具体实施措施；一些制度还缺乏持久性和连续性，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6. 以“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数”的传导不够扎实

一些党员干部片面认为，紧抓“关键少数”与自己所处的“绝大多数”角色无关，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敷衍了事，虽说按规定“全程留痕”，却沦为一种“认真”的形式主义，渐显“跑偏”“走样”的苗头。究其原因，一些党员干部，有意只论紧抓“关键少数”这个重点，而选择忽略引领“绝大多数”这个根本。有些党员干部甚至把“甘居中游”看作为人处世的“秘诀”，全然忘记勤政、廉政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对这些倾向必须高度警惕。

三 进一步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对策建议

目前，山西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是，

仍然处于“大病初愈”后的“康复治疗”期，全面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任务还很艰巨繁重，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还在不断出现。我们要在对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进行深刻反思、对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做法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韧劲，时刻警惕、坚决克服“解解压”、“松口气”、“歇歇脚”的心态，拧紧思想“总开关”，进一步强化全面优化政治生态的共识，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力争走出一条符合中央要求和政治生态建设规律的山西之路。

（一）抓“关键少数”与落实主体责任并举，彰显净化政治生态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作用

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用好纪律这根准绳和高压线，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约束“关键少数”。通过其表率作用，带领“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遵章守纪和整个社会风气持续好转。同时，各级党委（党组）要把肩负起管党治党责任始终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把责任一级一级扛起来，把压力一层一层压下去。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和“争一流”的使命感，敢于抓关键环节、善于抓突出矛盾和问题，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抓落实、重实干、求实效。只有这样，才能以“治不忘乱”、“安不忘危”、“严不松劲”的劲头，守住山西政治生态的“青山绿水”。

（二）严厉问责与容错纠错并举，努力形成愿作为、敢作为、会作为的良好政治氛围

针对一些为官不为现象，山西按照中央加快构建容错纠错机制，坚持“三个区分开”原则，出台了容错纠错和鼓励干部干事创业两个办法。目前，如何把握好严厉问责和容错纠错之间的度，建立正确的导向，做到有错必追究，失责必问责；怎样精准界定容错的范围，区分清

楚因公敢为和改革探索中的失误与错误，明确敢作为和乱作为之间的界限；如何确保按照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办事，做到公开公正等，要认真研究，进一步细化明确，既不能因容错纠错而成为一些干部违规违纪的借口，也不能因严厉问责而挫伤了一些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并举，厚植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结合山西实际，找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结合点，让党内纪律和规矩立起来。通过把思想建党的成功经验固化为制度体系，巩固思想建设成果；深入挖掘丰富的红色革命文化、廉政文化及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大力建设积极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净化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同时，全省各级党组织还要注重以提高廉洁意识为重点的党员领导干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不断更新党内政治生活气象，规范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内生动力，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四）转变政府职能与优化营商环境并举，构筑“清”“亲”政商关系

构建健康良好、清亲和谐的政商关系，是全面构筑良好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生态的关键。要深刻反思过去的教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阻断市场商品交易规则对政治生态的侵蚀渗透，构建新型“清”“亲”政商关系。同时，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减少审批事项，提高行政效能，提高办事透明度，减少自由裁量权和寻租空间。

（五）正党风政风与带民风社风持续好转并举，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政治社会文化氛围和环境

在构建良好政治生态过程中，要进一步把正风肃纪摆在重要位置，

正党风政风，转工作作风，促社风民风不断好转，形成党内党外互动、政治经济社会系统协同，各方面积极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要综合运用制度、规矩和纪律的作用，划定政治生态红线，使各项制度规矩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完善党内政治生态功能，把党外政治生态环境优化、政治生态评价和制度设计联动起来，以促进党的政治生态子系统的科学整合和外部生态环境的互动态势，着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生态链。

（六）实践探索与科学评估并举，构建政治生态评价体系

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确立评价框架，定量定性分析评估政治生态。所列举的评价指标和要素包括影响政治生态的方方面面，既突出政治生态建设要求，又注重履行职责情况；既立足于集成现有考核，又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测评。指标体系要细化分级，比如，针对领导干部，要包括廉洁度、公正度、诚信度、满意度以及信访举报查实、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行政问责、纪律处分、个人有关事项及财产申报是否真实等；针对职能部门和窗口单位，要包括廉洁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社会评价、公职人员违规违纪率，“三公”经费使用管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补偿制度执行、优化审批流程、政府部门信息公开、畅通信访渠道等情况等。同时，由于各要素对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大小会随着具体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在具体评估过程中，还要实施各评价指标间的联动考察、整体考察和动态考察，综合分析后找出被评价对象存在的不足及其改进不足的措施。

参考文献

- 丁继云、王泽斌，1997，《正本清源反腐败——1996年山西省“一整两反”工作纪实》，《正气》第5期。
- 刘宇、闫书敏，2017，《砥砺前行 振兴崛起 喜迎十九大·山西答卷 打造政治生态绿水青山》，《山西日报》9月29日，第10版。

人民网, 2018, 《山西: 持续高压反腐 2017 年处置问题线索 5 万件》, 2 月 24 日。

王继军, 2014, 《优化矿产资源领域政治生态法律问题研究——以山西腐败大案为例》,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 10 期。

《新京报》, 2015, 《山西 3 位市委书记 16 位县委书记 13 位县长空缺》, 3 月 6 日。

姚晋平、陈俊琦, 2017a, 《山西: 优化政治生态 提升发展状态》, 《人民日报》5 月 1 日。

姚晋平、陈俊琦, 2017b, 《切实践行讲话 奋力干事创业》, 《山西日报》9 月 9 日, 第 1 版。

赵向南, 2017, 《真理的力量 实践的力量》, 《山西日报》10 月 17 日, 第 1 版。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018, 《持续高压反腐 山西 2017 年处置问题线索 5 万件》, 2 月 24 日。